

国际关系

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与主流 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

思特格奇

内容提要：从地区国际关系及外交政策的现实出发，拉丁美洲产生了一些富有见地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其与源自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在很多方面都显得格格不入，彼此间对话、交流很少。本文简要回顾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各自的历史发展，并以发展主义、依附论、混合模式和外围现实主义作为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将其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作了比较。相比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拉美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象更宽泛，在研究方法上较不“科学化”，并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无政府状态”基本假设提出质疑。另外，从目标来看，拉美国际关系理论旨在解决发展问题，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则力图探索和解释国际关系的普遍规律。实际上，两类理论就是从不同的研究目标出发，沿着两种不同的逻辑路径发展，从而衍生出差异。所有这些差异也可以根据这两种不同的逻辑路径串联起来。最后，本文认为，两类理论间的差异对于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启示意义。

关键词：外围现实主义 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简介：思特格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美系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16)02-0109-21

拉美学界为国际关系研究贡献了许多思想和理论,然而,若把拉美本土的国际关系理论与源自美国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比较,会发现两者有着全然迥异的学术旨趣,两种思想传统几乎像是用不同的语言谈着不同的话题,彼此都无法嵌套入对方的体系之中。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两条平行的道路上衍生发展,两者在历史传统、理论目标、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态度与基本假设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本文将简要分析两种理论的发展历史,再以此为背景,具体梳理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差异,分析两者之间不同的逻辑推演链条,据此得出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若干参考与启发。

一 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起源与发展

一般认为,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正式形成是在一战之后不久。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美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历程:出于对一战的灾难性后果的反思,强调法律与道德的理想主义观点较为盛行;二战爆发后,理想主义遭到了汉斯·摩根索等现实主义学者的批判,现实主义在此后一段时间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其中,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①一书提出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与国际无政府状态等观点不仅确立了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也将国际关系研究大大地系统化与理论化。在20世纪70年代,肯尼斯·华尔兹又进一步将现实主义理论化,提出了强调国际结构对国家影响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这种国际关系理论如同自然科学那样具有严谨的逻辑,反映了倡导效仿自然科学来研究国际关系的科学方法压倒了过去传统方法^②,方法论的变迁也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之后,关注国际制度与国际文化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分别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出现并崛起,国际关系理论界也逐渐发展为当今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其他非主流学派共同繁荣的局面。^③在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

① [美] 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 参见秦亚青:《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载《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7期,第57-58页。

③ 林宏宇:《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沿革》,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5页。

建构主义三种理论中，影响国家这一国际体系基本单元的关键变量有所不同，分别是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国际制度与国际体系文化，但无疑这三种理论都是体系理论，都强调国际体系对于国家行为的根本影响^①，都意图对整个国际体系进行解释。除了这些体系理论外，西方学界还有一些研究更具体问题的理论，如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等，但这些理论往往也在三大理论的框架下展开，继承了三大理论的一些核心假设。而另外一些对主流体系理论的理性主义假定与实证主义方法进行质疑的理论较少得到主流理论的回应。^②

实际上，拉美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美国有着很大不同，拉美国际关系研究也有着自己丰富的思想和理论成果。如穆尼奥斯曾概括：“二战前，拉美对外关系的研究主线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国际法问题或特定国家的外交史，或是简要描述作为整体的拉美与美国或欧洲的历史联系。”^③从拉美国家独立后到二战前这段漫长的时期，拉美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思想成果主要集中于国际法方面，提出了卡尔沃主义、德拉戈主义、托瓦尔主义、埃斯特拉达主义等涉及国际法方面的原则。二战后，拉美的国际研究才渐渐地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结合了不同学科，超出了政治科学的限制范围。^④这样看来，拉美的国际关系学科的成型比美国更晚，而其研究领域比美国的国际关系领域更广泛。如洛温塔尔指出：“与美国不同，在拉美，国际关系领域从来没有附属于政治科学。与此相反，在历史上，这一领域被划归法律、历史、社会学等学科。拉美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也错过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与欧洲发生的‘科学主义（行为主义）’与‘传统’方法两派支持者间的方法论辩论。”^⑤也就是说，拉美国际关系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一定区别，在这种背景下，前者的思想成果虽然与后者有一定联系，但同时也有着各自的独立发展路径。根据学者阿琳·蒂克纳的梳理，战后拉美本土涉及国际关系方面的主要思想按照时间顺序依

^① 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第5-10页。

^② 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8-119页，第125-128页。

^{③④} Heraldo Muñoz, “The Dominant Themes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 in *World Affairs*, Vol. 150, No. 2, Fall 1987, p. 129.

^⑤ Abraham F. Lowenthal, “Research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Some Impressions”, i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18, No. 1, 1983, p. 161.

次包括：二战后初期的发展主义（又称结构主义或拉美经委会学派^①），盛行于六七十年代的依附论，在七八十年代影响力很高的强调“自主”概念并融合了依附论、现实主义与相互依存理论内容的混合模式，以及冷战结束前后阿根廷学者埃斯库德提出的外围现实主义。^②此外，还有一些非本土的与国际关系相关的思想和理论在拉美得到拓展延伸，如拉美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在南锥体国家，拉美民主化实现前也有学者对地缘政治的思想进行了演绎发展。

那么，上述一系列思想中，哪些可以被定义为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呢？要说明这一点，首先要阐明“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这一说法在本文中的意义，说明“国际关系”与“理论”分别具有怎样的具体内涵。

实际上，这两个概念都有争议与模糊之处。国际关系学科边界较为模糊。一方面，有的观点试图更狭义地定义国际关系。汉斯·摩根索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主要奠基者就曾特别强调国际关系作为独立的领域与其他学科的根本差异，这对之后的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种较为狭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实际上与“国际政治”“世界政治”意义相仿，彼此混用^③，国际关系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由此与经济学等学科相区别，且与国内政治等政治学其他分支也有差异。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又很难与其他学科完全割裂，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子学科的兴起就说明了这一点，随着国际体系的种种变化，更多经济领域的内容也进入了国际关系学者的视野。此外，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等学科的关系也重新变得密切，比如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两个学科经历了“始合、趋离、后分、再合”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也有了更多的学科交叉。^④

① 发展主义和依附论的关系十分紧密。依附论无疑从发展主义借鉴了很多思想，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发展主义是依附论的一个流派（关于依附论的流派及其划分，参见徐世澄主编：《拉丁美洲现代思潮》，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302-306页），但也有学者认为发展主义正是依附论批判的对象。本文无意于对依附论这一包容广泛的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因此本文采用蒂克纳的观点，认为依附论与发展主义的区别在于依附论往往主张激进的社会变革。实际上，甚至像卡多佐这样较为温和的依附论学者也认为需要进行社会政治的革新。

② 参见 Arlene B. Tickner, "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4, No. 4, 2003, pp. 325-350.

③ 李少军著：《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④ 徐崇利：《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之跨学科研究：历史与现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90页，第101页。

对于“理论”的定义同样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对理论的定义往往较为严苛，具有很强的科学化色彩。例如，华尔兹认为：“理论并非只是规律的集合，而是对规律的解释。”“理论是头脑中形成的一幅关于某一有限领域或范围内的行动的图画”。^①如果以此为标准，之前所述的大部分拉美国际关系思想或许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只有发展主义、依附论对不发达问题做出了逻辑严密的解释，但它们所解释的更多是经济问题而非国际关系问题。

在美国，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理论也排斥价值判断，如艾尔·巴比在《社会研究方法》中指出：“社会科学理论处理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应该如何’”^②，上文提及的拉美国际关系思想也不符合这一标准。但如果对“理论”做出更宽泛的定义，那么更多拉美国际关系思想则可以跻身理论之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将社会科学理论分为“对过去和当前的事实进行概括”的历史描述理论、“利用数学上的相互关系来指示未来的可能性”的科学预测理论和“用演绎方法推理改善事务的可能性和应该做的事”的思辨—规范理论。^③拉美国际关系思想很多可以归入“思辨—规范”理论的范畴。

另外，一般国际关系学者在使用“理论”一词时并不像华尔兹那样严格。例如，华尔兹、约瑟夫·奈等学者根据理论的严格标准，认为建构主义不是理论而更像是方法^④，但建构主义一般却被归为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之一。而一些研究国际规范、探讨价值的思想也被称为“规范理论”，由此可见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于“理论”的使用有时也依赖约定俗成而非固定标准。拉美学者对于理论的形式也不那么敏感，例如埃斯库德一方面承认外围现实主义“更是一种外交政策哲学而非实证社会科学”^⑤，但另一方面他也常将外围现实主义称为“规范理论”，可见他并不严格区分理论与哲学、思想、政策主张

① [美]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6页，第9页。

② [美] 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③ [美] 詹姆斯·多尔蒂等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④ [美]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XVI页；[美] 约瑟夫·奈著，张晓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五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页。

⑤ Carlos Escudé, *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Menem's Argentin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p. 132.

的区别。

本文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国际关系”与“理论”，认为国际关系不仅仅是政治关系，也涉及经济关系，而“理论”不仅限于对规律的解释，也包括对政策的演绎推理。由此，蒂克纳所归纳的思想基本可以视为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也是本文主要的讨论对象。其中，探讨发展问题的发展主义与依附论是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它们在涉及领域上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差异较大）；而混合模式、外围现实主义则可以视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种“思辨—规范理论”，它们对国际现实做出了自己的概括，并从此出发去研究拉美国家应采取怎样的外交政策。但是早先拉美学者提出的种种国际法原则在本文中则不被视为理论，因为这些原则实际上更多是陈述主张，而没有更多的演绎、论证。

根据蒂克纳的概括，战后拉美本土主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大致如下：二战后对经济发展的关注使得发展主义分析了国际分工对拉美国家的不利影响，并提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当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出现危机时，依附论应运而生，它虽然继承了发展主义的一些观点，但也批评发展主义太过保守，要求进行更激烈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由于依附论提出的激进变革难以实行，对拉美前景的判断显得有些悲观，于是混合模式吸收了依附论与一些主流理论的不同内容，提出了强调依靠国家实现“自主”来取得发展的更为现实的解决手段；当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和之后西方阵营在冷战中的胜利使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拉美得势之时，外围现实主义则与之相配合，反思过去过于强调“自主”而导致与大国对抗并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试图提出更务实的外交政策来保障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①如果说国际体系的变化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例如，和平、合作的增多推动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冷战的结束使人们进一步关注观念的变化，促进建构主义的兴起），那么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动力则在于拉美经济发展条件和环境的变化。

应该承认，拉美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间存在交集，尤其是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与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提出的

^① 参见 Arlene B. Tickner, “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4, No. 4, 2003, pp. 325–350; Arlene B. Tickner, “Latin American IR and the Primacy of lo Práctico”,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4, December 2008, pp. 735–748.

相互依存理论都对拉美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如蒂克纳所说,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从一开始,(拉美)区域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特征就是外来的美国影响和本土全球事务表述间的紧张”^①。不过,由于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借鉴并非全盘吸收而是有所偏重,最终两者的发展方向还是有较大差别。

那么,拉美本土理论在拉美国际关系研究中又分别有着怎样的地位、作用?上述的不同拉美本土理论随着时间变化在拉美有着怎样的兴衰发展?蒂克纳曾考察了1960—1998年期间5份拉美国际关系期刊^②中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一体化和安全这四个领域中若干话题的180篇论文,按照其内容将其归于不同的理论传统。这一统计很大程度上能反映这段时间拉美学界不同国际关系思想、理论的影响力及其变化。蒂克纳的分类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③

表1 1960—1998年期间5份拉美国际关系期刊内不同理论传统文章数量及占比

理论传统	1960—1977		1978—1987		1988—1998	
	文章篇数	占比(%)	文章篇数	占比(%)	文章篇数	占比(%)
经典国家中心主义传统	2	7.69	4	6.78	7	7.37
经典非国家中心传统	0	0.00	8	13.56	15	15.79
一般经典传统	0	0.00	5	8.47	7	7.37
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	5	19.23	9	15.25	3	3.16
后现代传统	0	0.00	0	0.00	4	4.21
建构主义	0	0.00	0	0.00	1	1.05
拉美混合模式	9	34.62	27	45.76	15	15.79
外交政策分析	0	0.00	2	3.39	7	7.37
其他	10	38.46	4	6.78	36	37.89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资料整理 Arlene B. Tickner, “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4, No. 4, 2003, pp. 335 - 341.

① Arlene B. Tickner, “Latin American IR and the Primacy of lo Práctico”,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4, December 2008, p. 740.

② 这五份期刊分别是巴西的 *Contexto Internacional*, 智利的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哥伦比亚的 *Colombia Internacional*, 哥斯达黎加的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和墨西哥的 *Foro Internacional*.

③ 关于理论传统的分类,蒂克纳有大致如下的说明:经典传统主要关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秩序的源泉、稳定与不稳定、战争与和平等问题。这种经典传统包括国家中心传统和非国家中心传统。国家中心传统包括经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蒂克纳把新自由制度主义也纳入了这一类别。非国家中心传统包括相互依存、自由主义、一体化理论。一般经典理论类的文章与经典传统有相似关切,但没有表明倾向认为国际体系的中心行为体是国家还是非国家。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则包括帝国主义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批判理论。表1中其余分类与一般学术界定大致相似。

从表1可以看出,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拉美学界都有一定影响,而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力在拉美要高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拉美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针对解决拉美的发展问题而提出,其兴衰也与其所提出政策的效用有关。表1也能反映出这种变化:例如混合模式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但在冷战结束前后随着观念的变化,其影响力已开始下降,在论文中使用减少。拉美国际关系学界的确受到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但拉美学界对这种影响的吸收是有选择的,同时也保持了很强烈的独立性,其本土理论有着独立的发展空间。

如今的拉美国际关系研究受美国影响较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在拉美的影响有所上升。所以,尽管拉美国际关系研究在内容与方法上固然仍与美国有所不同,但与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也产生了一定距离。而且,拉美学者从事的国际关系研究并不一定带有拉美本土国际关系思想的特色,无疑有拉美学者会运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定量方法进行研究^①,只是这类研究在拉美还不占主导地位,而且这些美国化的研究也已不能划入拉美本土国际关系学术传统之内。另外,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无论在美国还是拉美的国际关系研究中都略显冷门^②,这也对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地位产生了进一步的不利影响。

纵观学科发展史,拉美的国际关系学科与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科从一开始就有很大不同,拉美有自己的国际关系学术传统,也由此产生了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关切与兴趣,有着很强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但也正因为如此,其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又有着巨大的差异,下文将对这些差异做出具体分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是拉美衍生出的国际关系思想理论与源自美国的

① 如 Octavio Amorim Neto and Andrés Malamud, "What Determines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Systemic versus Domestic Factors in Argentina, Brazil, and Mexico, 1946-2008",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 Society*, Vol. 57, No. 4, 2015, pp. 1-27. 本文运用定量方法分析了体系变量与国内层次变量对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三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② 参见 Arlene B. Tickner, "Latin America: Still Policy Dependent after All These Years?", in Arlene B. Tickner and Ole Wæver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Abingdon,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32-52; John J. Mearsheimer, "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Hypothesis Testing Has Become Bad for IR". <http://mearsheimer.uchicago.edu/pdfs/Leaving%20Theory%20Behind%20EJIR.pdf>. [2015-12-22]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间存在的差异，这并不完全等同于两个地区国际关系学科整体发展的差异。

二 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差异

从理论本身看，拉美本土国际关系思想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差异体现在理论假设、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态度三个层次上。

(一) 理论假设的差异

从理论假设来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拉美本土国际关系思想对于国际关系现实的认识有很大区别。这主要体现在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假设的认识上。尽管对无政府状态的意义有所争议，但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基本都接受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假设。^① 基本而言，主流理论都承认国际关系中没有能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威，在国际体系中不存在像国内政治的政府那样可以合法垄断暴力的机构。在此基础上，华尔兹还提出，在等级制领域中，单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与分工；而在无政府领域里，虽然国家之间在能力上差异很大，却有着总体上相似的功能，并倾向于保持功能的独立，避免过度依赖他国。^②

然而，拉美本土国际关系思想更倾向于用一种“中心—外围”的视角看待国际关系，把拉美国家视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外围国家，这使得拉美本土国际关系思想中的国际关系具有等级制特征而非无政府状态。如上文所述，华尔兹不认为是国家能力的差异导致了国家功能和性质的不同，但一系列拉美本土国际关系思想都认为部分国家是依附于另一部分国家，这意味着国际体系中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功能。

发展主义、依附论更多是从经济依附的角度出发强调国际体系的等级性，强调不同国家在国际经济中分工的不同及这种分工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例如，多斯桑托斯认为，“统治国对依附国拥有技术、贸易、资本和社会政治方面的

^①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无政府状态问题上的争议主要在于无政府状态中合作存在的多寡。温特的建构主义则认为无政府状态可以包括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康德结构，并不一定等价于权力政治，只有霍布斯结构才是真正的自助体系。参见俞正梁：《国际无政府状态辨析》，载《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② 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08-111页。

优势（在不同历史时期拥有上述范围内某些方面的优势），从而使它们得以对依附国强加条件、进行剥削并掠走其国内生产的部分盈余”^①，暗示了国际体系中不同国家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和等级的存在。有时候，拉美学者对政治的论述也反映出一种“等级制”的意味，如普雷维什认为“中心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超级大国，使用这些不同的行动和诱导方式，使外围国家程度不同地服从于中心国家做出的决定，或者被迫采取本来不应采取的决定，或者被迫放弃哪怕是对本国利益有利的决定”^②。普雷维什眼中的这种存在命令与服从关系的国际体系很难视为典型的无政府状态，而更有等级制的味道。多斯桑托斯在论述美国战后地位存在的条件时指出：“资本主义在竞争基础上产生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它用武力来解决竞争问题，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集中、集权和垄断……但是，垄断不能彻底消灭竞争，只能造成新的竞争形式，迫使国家之间为保持霸权而进行无休止的斗争”^③，从这可以看出，多斯桑托斯的国际政治观具有较强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认为国际体系在无政府状态与某种“集中、垄断”（接近“有政府”和等级制）之间摇摆，而这种认识无疑也与西方理论家不同。多斯桑托斯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的不同还在于对国际行为主体的认识：主流理论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多斯桑托斯则还强调国际体系主要矛盾的阶级性。^④

混合模式和外围现实主义则更加强调政治领域的等级性。^⑤混合模式的代表人物胡安·卡洛斯·普伊格认为，在国际体系的等级机制中有三种类型的国际行为体共存：批准和通过决定的高级发布者，执行决定的次级发布者和仅仅服从决定的接受者。^⑥外围现实主义的提出者埃斯库德认为，在和平与安全议题上，“等级制”相对“无政府状态”更符合国际体系的现实（不过埃

① [巴西]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毛金里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② [阿根廷] 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袁兴昌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93-194页。

③④ [巴西]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毛金里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5页，第25-30页。

⑤ 由于大部分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在诞生时间上要早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正式成型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以无法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回应，而后者并没有对前者表现出太多的关注。外围现实主义则出现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相对成型之后，在阐释自己的思想理论时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直接的批评，这些批评集中反映了拉美本土国际关系思想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差异。因此，本文在比较拉美与美国两种思想理论体系时，会较多以外围现实主义为例。

⑥ Arlene B. Tickner, "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4, No. 4, 2003, p. 331.

斯库德认为这种等级制是一种“初步”的等级制，其在程度上要低于国内的有政府的“等级制”，并且他认为主要大国间的关系也是“无政府状态”的)。埃斯库德认为无政府状态应是指“国际关系中没有政府或支配性的治理原则”^①，按照这种定义，一个没有世界政府但有足够规则的体系也可以说是“等级制”的。由此，埃斯库德有以下理由支持他的国际社会“等级制”观点：首先，他认为在国际法与联合国安理会、《核不扩散条约》等机制中，不同国家之间有着不平等的一面；其次，他同其他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一样强调国家间能力上存在巨大差异，并认为这种差异足以使国家之间产生功能上的区别。大国有能力对一些令其不满的小国施加让小国难以承受的经济制裁，结果，那些关注财富与发展的国家就会选择顺从大国，但一味看重权力而不在于国民福祉的国家则会选择对抗。于是，国家能力的差异就使不同国家在国际体系内分别履行“命令”“服从”“反抗”的功能。此外，埃斯库德也不认为国家像华尔兹说的那样倾向于保持功能独立，他认为有很多国家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实行生产和出口的专门化。

(二) 研究对象的差异

首先，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侧重于政策层面，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侧重于探寻某种国际关系的普遍性规律。拉美本土国际关系思想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实际都有对国际关系现实的描述，但前者的侧重点在于根据这些解释为拉美国家提出一些政策。可以说，不同的拉美本土国际关系思想都侧重在行动层面提出自己的主张：发展主义主张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依附论则提出更激进的主张，甚至提出对外“脱钩”，对内进行社会革命；混合模式希望通过加强国家能力来实现发展，提出借助外围国家的区域联盟、政治经济一体化和更好的谈判策略来动员外围地区的权力资源^②；外围现实主义则强调外围国家应避免参与权力争夺、避免执行过于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专注发展经济，避免与大国对抗，甚至要寻求追随主导性的大国或国家联盟，尽可能与之结盟。^③ 相形之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政策的指导性并不那么直接，实

^① Carlos Escudé, “An Introduction to Peripheral Re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state System: Argentina and the Cónдор II Missile”, in Stephanie G. Neuman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 61.

^② Arlene B. Tickner, “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4, No. 4, 2003, p. 332.

^③ 参见 Carlos Escudé, *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Menem's Argentin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pp. 87 - 89.

际上也不准备给出具体的政策。如华尔兹曾做出如下评论：“国际政治理论并不必然包含或者需要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正如市场理论不必包含或者需要公司理论一样……国际政治理论仅告诉我们各国政策所必须应对的国际环境是什么”^①。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关心一些较为宏观和抽象的问题，例如哪种国际体系结构更为稳定、国际制度对于合作的影响、国家的身份如何获得等等。简而言之，它们关注国际关系宏观意义上的变量和机制，寻求从整体上解释国际关系而非为特定国家设计外交政策。实际上，从“两极结构比多极结构更稳定”抑或“国际制度可以促进合作”这样的结论出发，特定国家也根本无法去为自身设计相应的具体政策，至多也只是仅仅看到制定政策的朦胧方向。

其次，拉美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领域比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更广泛，对经济领域、国内政治有更多的关注。发展主义、依附论、强调“自主”的混合模式都在探求拉美国家如何打破“中心—外围”结构从而取得经济发展的途径，外围现实主义也是旨在寻求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的外交政策。依附论、混合模式和外围现实主义都把注意力投向了国内政治：依附论的一些流派批评国内部分集团成为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并强调摆脱依附需要通过革命来改变国内结构；混合模式的观点较为乐观，但强调的同样是国内精英对于加强国家自主性的作用，也是要从内部解决问题；外围现实主义则十分关注外交政策是为公民服务还是为统治精英服务的问题，认为一些打着“为国家争取权力”旗号的外交政策只是服务于精英的利益而实际牺牲了国内公民的利益。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则主要关注的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在政治领域的互动，只有新自由制度主义对经济领域有更多关注。由于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都是体系理论，因此对于国内政治涉及较少，其“无政府状态”假设突出了国际政治“无政府”与国内政治“有政府”的区别。另外，为了批评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念，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之初还刻意强调国际关系与其他非政治学科的区别。如前所述，汉斯·摩根索在奠定国际关系学科的基础之时，为了消除理想主义的误区，努力把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等学科区分开来。他提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政治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

^① [美]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75-76页。

的道路的主要路标，使政治成为行动和知识的独立领域，从而与其他领域如经济学、伦理学、美学或宗教区分开来。^① 结果，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探索的领域比拉美国际关系理论更窄。拉美学者则并不认同这种学科间泾渭分明的划分，如埃斯库德对摩根索的上述看法提出批评，认为“帮助政治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是以经济发展界定的利益^②，因为从长期看权力是建立在发展与财富之上。在埃斯库德看来，忽略了经济元素反而会对国际关系产生误解，使得阿根廷这样的外围国家一味追逐权力从而损害经济发展，反而失去了未来的潜在权力。

（三）研究方法及态度的差异

首先，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比拉美国际关系理论更加青睐“科学化”。埃斯库德如此嘲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理论家们幼稚地尝试模仿自然科学来研究国家——就好像这些国家是星球或次原子粒子一样”。^③ 然而，这很大程度上正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追求的，主流理论家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想用一些模型来简化复杂的国际关系，例如在某些时候把行为体假设为自利的、理性的，并通过严谨的逻辑推导逐步在不同变量间建立类似自然科学变量间简洁明确的联系。这集中表现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体系方法的推崇上。尽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都承认存在着体系不能解释的事物，但为了从纷繁复杂的事实中提炼出大体的规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选择了体系的研究方法，把国家视为体系内的单元，强调国际体系对国际行为体的影响与建构。如前文所述，拉美国际关系理论虽然也在体系层面划分“中心”和“外围”，但又都对国内政治十分关心，即使是最具有体系方法特点的依附论也没有忽略国内政治的因素，例如依附论学者卡多佐和法勒托认为：“在分析依附时我们不应将其视为一种‘外部变量’，而应在依附国家各社会阶级间关系体系的框架内对其进行分析。”^④ 这在华尔兹看来，无疑是与体系方法相反的“还原主义”方法。相对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从经济学（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学（建构主义）借鉴方法，拉美国际关系

^① [美] 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②③} Carlos Escudé, *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Menem's Argentin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p. 54, p. 85.

^④ [巴西]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等著，单楚译：《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理论使用的分析方法较为传统，更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阶级分析、辩证法）或者用传统的历史、哲学的方法分析问题，与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方法保持了距离。

其次，与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相比，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更倾向于价值中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信奉实证主义，相信“客观事实和价值观念可以分离，客观事实独立于任何理论；社会界和自然界一样存在客观规律，这些规律是可以被发现的”^①。而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掩饰自身的价值立场。所有的拉美国际关系理论都旗帜鲜明地站在拉美国家的立场上进行分析，而不像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那样旨在探求“普世性”的规律。发展主义和依附论具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对于剥削、不平等有着强烈的义愤，例如普雷维什批评外围资本主义“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我们在前面说的，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将经济剩余攫为己有”^②，这种批评完全是从道义价值出发。又如多斯桑托斯表示：“不是在革命中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广大群众开辟一条发展和进步的道路，就是诉诸法西斯野蛮统治……”^③，他毫不避讳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推崇，并使用“发展”“进步”等包含价值色彩的词语来修饰社会主义。外围现实主义则带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强调“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保卫个体公民的权利和福利”^④，并用这种价值观对阿根廷之前的政策进行批判。拉美学者并不太相信国际关系可以作为科学研究，如埃斯库德并不认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中立”，他赞成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考克斯“理论总是服务于某些人、某种目的，所有的理论都有立场”的观点。^⑤埃斯库德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民族主义

①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XIII页。

② [阿根廷] 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0页。

③ [巴西]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毛金里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96页。

④ Carlos Escudé, *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Menem's Argentin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p. 24.

⑤ R.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07. 转引自 Carlos Escudé, *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Menem's Argentin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p. 130.

的意识形态^①。可以说，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家们不刻意追求、甚至也并不认可“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

三 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目标及逻辑

从上文可以看出，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正误之分。“国际关系是等级制抑或无政府状态”“国际关系与其他相关学科在研究中应该关联起来还是分隔开来”“国际关系应运用体系方法还是用还原主义方法研究”“是否应该以价值中立的态度进行研究”等等问题都很富争议而有一定的相对性。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或许归根结底与不同的研究目标有关，研究目标的不同导致了研究对象的差异，从而又导致了研究方法、态度和基本观点的不同。

实际上，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所有的拉美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围绕着“发展”这一主题展开，希望为发展提供可行的方案或提出至少是有利于发展的外交政策。拉美国际关系学界非常强调实践与应用，那些尝试使自己与实务保持距离的学者则会受到“太过学术”的批评^②。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理论是要直接为指导政策、改善现实服务，理论强调的是拉美国家所处的环境“是什么”和在现实中“怎么办”的问题。相比之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追求的目标完全不同。在国际关系理论最初发展的年代（一战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初期），美国才摆脱孤立主义不久，刚开始寻求在国际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对国际体系还略感陌生，并一度有着理想主义的幻想，所以从一开始，理论的任务就是对现有国际关系“是什么”与“为什么”做出描述与解释。后来美国慢慢适应了国际体系并成为国际体系种种规则的娴熟运用者，但作为一个在全世界有着广泛利益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于国际体系总体结构、国际体系行为模式的种种变化依然会有更多关注。随着国际关系学科在美国逐渐被科学化，像自然科学和包

^① Carlos Escudé, *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Menem's Argentin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p. 70.

^② Arlene B. Tickner, "Latin American IR and the Primacy of *lo Práctico*",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4, December 2008, p. 745.

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那样把国际关系理论视为对规律的解释也显得更加顺理成章。总之，主流国际关系学界把描述和解释现实当作理论的目标，并不要求理论与现实政策有更直接的关系。

理论目标的不同无疑会导致研究对象的不同。拉美学者希望创建解决经济不发达问题的理论，因此旨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具体政策自然是讨论的重点；为了使政策建议能够在实践中行之有效，拉美学者必须综合考虑经济、政治、国外因素等方方面面，研究范围必须很广泛。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则是为了（特别是在美国各界对国际关系还没有明确认识之时）解释国际关系，所以需要阐明国际关系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突出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而不会对具体国家如何制定政策有过多论述，反而更多聚焦于国际关系的普遍规律与共性，希望通过掌握这些大体的规律而对国际关系有整体的认识。

研究对象的差异导致了研究方法与态度的区别。为了研究并制定拉美国家的具体政策，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考虑拉美国家的具体情况以免其政策建议会发生水土不服，因此不仅使用“中心—外围”这种结构式的分析框架，同时也十分侧重较微观层次的分析。一些外围国家的政策是体系理论难以解释的，这些政策会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视为一般规律外的特殊个案而遭到忽视，但对于来自外围国家的学者而言，这些例外的政策很有研究的必要，不能解释这些政策的研究方法对拉美学者来说意义不大。例如埃斯库德作为阿根廷学者自然会关注阿根廷发动马岛战争的原因，而这种非理性的决策从体系的层次很难解释，埃斯库德也由此对体系方法提出质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情况则与此相反：为了抽象出国际关系的大致规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对国际关系进行简化，即采用体系方法。华尔兹认为：“描述越完整，解释力就越小，而一个简洁精致的理论最富解释力。”^① 体系方法的优点在于剥离细节而凸显国际关系的主要框架，能够更好地帮助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理解其研究对象。因此，虽然体系方法会造成一些问题被忽略，却依然得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的推崇。

研究对象不同也造成了研究态度的差异。拉美学者关心的是旨在改变现实的政策，这些政策会给国家和民众的命运带来极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考虑政策到底对谁真正有利、是否公平正义是十分必要的。由此，拉美国际

^① [美]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7页。

关系理论不可能脱离价值讨论。由于拉美种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就是拉美的发展问题，旨在为拉美国家提供对策，所以也就不可能、也不愿意在研究中做到完全中立。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相信客观事实、客观规律的存在，并以为之为研究对象，因此不希望对客观事物的研究遭到主观价值判断的干扰。虽然实际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对规律的提取和对因果的解释也很可能受他们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但在试图解释现实的过程中，规避价值观的影响远比在制定现实政策时相对更为可能。而为了使其对现实的解释能被更多人接受，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也必须使自身的理论显得相对客观中立。

当然，研究方法和态度的区别也与国际关系学科在美国与拉美的不同学术传统有关。拉美的国际关系学科没有经历“行为主义”的影响，因此对于价值中立和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并不青睐。

最后，研究对象的不同也导致了对于国际关系基本假定和判断的不同。关于国际体系到底是无政府状态还是等级制，其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主流三大理论都以无政府状态作为理论前提，但也有西方学者对此提出质疑。^① 拉美学者埃斯库德认为在安全议题上国际关系存在一个“初步的等级制”，也就是说他也承认国际关系现实介于无政府与等级制之间，只是“从外围比从中心更容易看到这种等级制”。^② 拉美国家关心外围国家的发展，因此也会聚焦于外围国家落后于中心国家的方方面面，关注发达国家利用自身优势而施加给外围国家的种种限制，从而更多看到国家间的不同。主流理论更关心国际关系的大体形势，于是倾向于忽视对国际关系影响较小的小国，将其视为与大国功能相似只是能力更弱的单元。但实际上不同国家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侧重强调哪一面实际上也是研究重点所决定的。

总之，两种理论传统之间的各种差异并不存在绝对的对错之别，恰恰是由于两种理论传统沿着不同的逻辑路径推演发展，才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选择了不同的观点。而两种学术传统间的种种差异实际上也彼此相关：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史，从一开始就背负

^① 如海伦·米尔纳认为国际政治实则处于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之间的多头政治（polyarchic），戴维·莱克则认为国际政治中存在等级制。参见[美]海伦·米尔纳：《政治的理性化：正在显现的国际政治、美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研究的综合》，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等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40-174页；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Carlos Escudé, *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Menem's Argentin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p. 62.

着不同的目标，也因此造成了两者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进而产生了在研究方法、态度和对国际关系基本判断上的差异；而这一系列差异的存在也造成了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间沟通的困难。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逻辑，大致可以如图1和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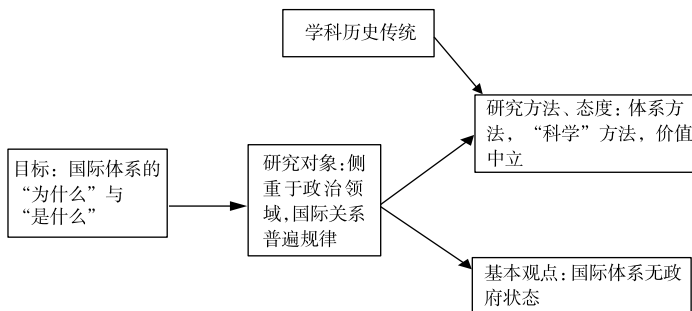


图1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推演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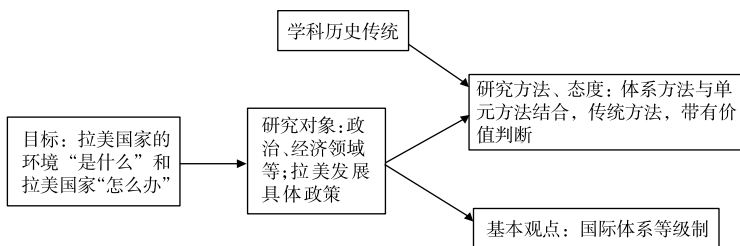


图2 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推演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四 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近些年来，中国学者也在积极寻求创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值得中国学者借鉴，特别是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差异非常值得有志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思考。

总体上，拉美本土思想代表了一种以政策为导向的、运用传统方法的学术传统，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则体现了一种以寻求规律的解释为中心的科学化的学术传统。这两种学术传统都有着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拉美国际关系理

论不像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那样严谨、成体系，尽管主要的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基本都围绕着发展的主题，但各自讨论的具体问题则可能较为分散，不属于同一领域、同一层次；另外，由于这些理论主要关注拉美国家，也缺乏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那样广泛的解释力（至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以整体上解释国际关系为目标），对于发达国家的意义相对有限。相比之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似乎又存在对现实过度简化从而脱离现实的问题，然而，西方国际关系学科越来越重视经济与政治的关联（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国内政治的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较为强调这一点），这正是对过去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疏漏环节的反思。

中国学者在尝试建构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努力的方向与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较为一致。很多中国学者都倾向于以中国的一些现实问题与诉求为导向去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并力求从中国古典思想和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而中国古典思想在方法论上无疑与现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大相径庭。由此，未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目标上也不同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基本观点也会因此有别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未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很可能像拉美的国际关系理论那样更侧重政策研究，在方法上更加传统。这样一来，未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可能会在以下两个方面遭遇问题和挑战。

第一类挑战来自于理论领域。也许未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会像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一样，因为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和学术规范不同而彼此难以沟通，其作为理论的地位也有可能遭受西方学界的质疑。也有学者试图把较为传统的研究对象与西方式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例如以阎学通为代表的“清华路径”强调运用科学方法，但也侧重从中国古典思想中提取中国元素。可是，中国古代哲人并没有用现代科学方法构建自己的思想，中国古典思想有时很难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若一定要在未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突出中国传统思想的话，那么其研究方法就很难与西方或美国式社会科学一致。如有学者认为阎学通“用科学方法解读荀子，因而忽视了荀子言论的意识形态性，更加忽视了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言论是难以有效地用科学方法来解读的。”^①另外，虽然中国学者在尝试创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时会把目光更多投向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政策需要，但中国的国际学科研究却又在努力

^① 张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4期，第140页。

学习量化、科学化等美国式方法，这会不会使得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尴尬（本土理论在本土学者的研究中淡出）也成为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遭遇？不过，如果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仅以满足中国的政策需求为宗旨，就不一定要去谋求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分庭抗礼的地位，也不必拘泥于西方的理论形式。

此外，由于非西方学者彼此之间在研究方法上可能具有相似性，中国学者在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时也应该关注与其他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系与区别。譬如，中国学者阎学通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也强调不同类别国家功能的不同，这种观点相对于结构现实主义来说是一种不同见解，但与拉美的一系列国际关系理论却有所相似，只是阎学通对国家的分类与拉美学者不同。^① 所以，在很多问题上，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应加强对其他非西方国际关系的了解和借鉴；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应注意自己的理论与其他非西方世界理论的区别，使自己的理论不仅相对于主流理论来说是创新，相对于其他非主流理论也是创新。当然，如果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旨在服务中国政策、彰显中国传统特色的话，那么，由于中国在历史经验与现实地位方面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未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即使与其他国家的理论有相似性，也不会与其完全相同。

第二类挑战来自于理论与现实及政策的关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界、学界人士常常批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能指导其本国的国际关系政策。然而，如前文所述，高度抽象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更多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即使对于其发源地美国来说也未必能在具体国际关系情境中提供直接、明确的建议。或许，并不仅仅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决政策制定的问题，而是国际关系学科中理论与现实间存在距离。毕竟，根据华尔兹的观点，理论本来就不一定要为政策服务，而政策的成功也不完全依赖于理论，毕竟早在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之前，一些天才的外交家早就筹划过种种睿智的外交政策。这样看来，中国学者如果仅是想为政策服务，可能并不一定需要去创建理论，而是可以直接进行政策分析。如果一定要创建理论的话，那么中国学者对“理论”的理解、定义应该也和主流理论不同，中国学者构建的理论会更强调理论的实用价值和现实关怀，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

^① 参见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4页，第119页。

论可能会和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相似。

然而，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历可能提供了另一个方向的经验教训。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一向与政策、现实有着更密切的联系。依附论的很多观点虽然由于太激进而不能被政府采用，但这些观点却对拉美的各种左翼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当今拉美一些左翼政府对社会主义的推崇实际也与依附论学者将社会主义视为解决发展问题方法的观念有契合之处。相比之下，拉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与拉美国家政策的关系甚至更为紧密：发展主义的观点直接推动拉美国家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混合模式鼓励拉美国家采取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外交政策，而外围现实主义则很大程度上解释并支持阿根廷梅内姆政府亲西方的外交政策。问题在于，这些理论的命运也自此与政治实践效果相挂钩，由于这些理论都没有能真正解决拉美的发展问题，它们在其所推崇的政策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后往往被搁置一边。从政策角度说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从理论角度说则多少有些可惜，因为理论中的一些合理成分可能也随着理论所支持政策的失败而一并被否定。例如，埃斯库德曾感慨：“如今，随着政策的失败和国家（经济）在 2001 ~ 2002 年的崩溃，阿根廷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相比之前更具敌意，这使得外围现实主义几乎不可能卷土重来”^①。实际上，作为一个较单纯的外交政策理论，很难说外围现实主义应该对阿根廷经济的崩溃负直接责任，但由于其与造成经济危机的梅内姆政府关联密切而且本身不符合阿根廷长期形成的外交传统和民族情绪，所以这一理论也受到牵连而被束之高阁。这样看来，理论或许应与政策保持一定的距离，独立于政治现实的波澜变化，才有可能获得更持久的生命力。

可见，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学界与政界之间是否应保持一定距离以及应该保持多大的距离，都是需要谨慎思考的重大问题。美国和拉美的国际关系学科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应该对此进行思考。

（责任编辑 黄念）

^① Carlos Escudé, “Peripheral Realism: An Argentine Theory – Building Experience, 1986 – 1997”.
http://www.argentina-rree.com/Peripheral%20Realism%20-%20Theory%20building%20experience.pdf.
[2016-03-18]